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6 年 7 月 16-17 日)

1、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数据中心争议折射美国人工智能治理权之争

7 月 7 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技术创新中心（CTI）治理研究部访问研究员汤姆·惠勒（Tom Wheeler）的文章《数据中心反弹凸显人工智能权力博弈》。文章认为，美国各地民间的反对行动已导致多个数据中心项目被阻止或推迟，这反映出民众对人工智能冲击日常生活以及就业前景的广泛担忧。人工智能已从技术议题演变为关乎权力分配和民主治理的政治议题，其核心在于应当由谁控制基础设施，以及这些基础设施服务于公共利益还是大型科技企业以及其投资者的利益。当前围绕人工智能治理的权力斗争主要表现为大型科技企业投入数千万美元设立“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试图主导人工智能时代规则的制定；同时企业基层员工也组建护栏联盟，主张加强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的监管，而非完全依赖企业自身作出决定。文章强调，当前围绕人工智能的政治争论具有明显的跨党派特征，伴随美国正式步入选举关键阶段，这场争论已演变为对民主问责机制的全民公投。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data-center-backlash-signals-a-fight-over-ai-power/>

编译：程果

2、美国兰德公司：美国人工智能战略须以全球风险为硬约束

7月7日，美国兰德公司发表政策研究员、教授贝芭·齐布拉利奇（Beba Cibralic）的文章《战略家困境：美国人工智能战略中的主体中立理由和主体相关理由》。文章将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关于主体相关理由与主体中立理由的二分框架应用于分析美国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的挑战。内格尔认为，中立理由可以普适形式表述，无须指向特定主体；相关理由则必然包含对特定主体的指向。两种理由分别源于客观非个人立场与特定行动者立场，均对行动提出正当要求，实践推理无法消除二者张力。当前国家领导人在构建人工智能国家战略时陷入上述双重理由拉扯形成的困境：一方面，领导人负有保护本国公民的义务；另一方面，变革性人工智能（Transformative AI）带来的全球性重大风险，衍生出不分国籍、保护全人类免受重大伤害的主体中立义务。文章强调，不应将二者视为可对等权衡、相互妥协的两类考量。相反，毁灭性且不可逆的风险应首先构成美人工智能战略的前置刚性约束。在人工智能战略制定过程中，防止全人类遭受灾难性伤害的底线义务需要优先于国家间的竞争性考量。

<https://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A4931-1.html>

编译：孙韵雯

3、美国兰德公司：自主智能体将大幅释放网络攻击战略破坏力

7月14日，美国兰德公司发表乔治城大学实践教授迈克尔·苏尔迈耶（Michael Sulmeyer）的文章《人工智能与战略性网络攻击风险》。学界、媒体与美官方文件长期将网络武器视作大国战略博弈关键手段，但过去二十年间，各类网络实战行动大多仅能实现战术效果，难以产生影响国家核心利益的具有持续性的战略打击。这种落差源于三重结构性限制：一是网络攻击效果难以精准预判，目标网络微小配置调整即可使整套作战方案失效；二是相关行动密级过高，跨部门一体化战略协同难以落地；三是高端复杂网络行动极度依赖稀缺顶尖技术人才，人力供给制约大规模作战行动落地。震网、NotPetya等典型事件直观体现网络作战的理想价值与现实瓶颈，自主智能体人工智能能够直击人才短缺核心痛点：该系统可自主完成漏洞探测、多级渗透并动态调整攻击方案，仅需少量人员便能同步管控多场复杂行动，显著降低高端网络攻击实施门槛。不过人工智能对预判偏差、涉密协同两大短板改善作用存在明显局限，自主运行还会引发行动失控、偏离战略目标等全新风险。2025年已有公开案例证实，大模型驱动的自主人工智能系统可主导跨国网络渗透行动。人工智

能赋能大规模战略网络袭击的风险持续攀升，各国亟需重塑网络防御与战略威慑框架，搭建适配自主智能体威胁的完整风险防控机制。

<https://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A4901-1.html>

编译：钟珺雯

4、报业辛迪加：人工智能治理需构建兼顾安全、创新与国际合作的全球治理框架

7月13日，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西班牙前外交大臣、世界银行集团前高级副行长兼总法律顾问安娜·帕拉西奥（Ana Palacio）的文章《人工智能治理的要求》。文章认为，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已远超社会制度、监管体系和公共治理能力的适应速度，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不应局限于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平衡，而应建立兼顾国家安全、产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综合治理框架。人工智能高度依赖巨额资本、芯片、供应链与数据中心等实体基础设施，并已广泛应用于军事、网络安全、情报分析、工业自动化等关键领域，前沿模型、先进芯片和算力资源正成为国家战略竞争的重要支撑。同时，中美围绕人工智能主导权的竞争持续加剧，人工智能技术商业化程度高、扩散速度快、成果难以核查，进一步增加了国际治理难度。文章建议，国际社会可借鉴《巴黎协定》与核不扩散机制经验，建立基于“核验型信任”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围绕前沿模型分类、风险评估、事件报告、独立测试

及敏感领域部署等建立统一标准，并通过持续核查机制提升各国履约可信度。同时，应推动科技大国、中等强国、发展中国家以及企业、高校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避免人工智能治理沦为地缘政治竞争工具。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i-governance-framework-by-ana-palacio-2026-07>

编译：高美琳

5、美国 CSIS：人工智能将渐进式重塑恐怖主义

7月10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战争、非常规威胁和恐怖主义项目主任丹尼尔·拜曼（Daniel Byman）与西北大学教授 V·S·苏布拉马尼亚（V.S. Subrahmanian）的文章《人工智能与恐怖主义的未来》。文章认为，人工智能对恐怖主义的影响将是渐进式的而非颠覆性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防范滥用与保护公民自由之间取得平衡。恐怖组织历来是保守的技术采纳者而非创新者，受资源有限、组织分散、行动失败代价极高等因素限制，强烈依赖成熟可靠、低成本的袭击手段。人工智能主要提升宣传招募、激进化、虚假信息、筹资欺诈与行动辅助等环节的效率。生成式人工智能降低宣传成本并实现个性化定制，深度伪造可能加剧危机时期的虚假信息与社会恐慌。极端聊天机器人可充当虚拟招募者强化个体激进化，相关工具还提升筹资效率并辅助行动策划与情报分析。但平台反制、行动执行

易失败及生物武器化的高门槛仍构成现实制约，单项技术威胁不应被夸大。同时，人工智能也赋能反恐，可强化情报研判、异常识别与网络监测能力，但概率性预测易致算法偏见、误判与过度监控，甚至侵蚀隐私保护与法治原则。据此，文章提出民主国家应对反恐系统开展独立审计，改善公私协调，重视生化风险评估，维护公民自由与司法问责，以兼顾人工智能竞争力与风险防控。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future-terrorism#h2-the-issue>

编译：杜宛鸿

6、美国《科技政策报》：中美应停止人工智能模型主导权之争

7月14日，美国《科技政策报》发表乔治城大学研究生院传播、文化与技术项目、哲学系兼职教授马克·麦卡锡（Mark MacCarthy）的文章《中美如何能从人工智能模型霸权的争夺中后退一步》。文章认为，中美两国正陷入对人工智能霸权的争夺，双方均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针对彼此顶尖人工智能模型设置准入壁垒。美国通过出口管制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模型，并禁止美国政府及企业使用中国模型。中国则要求其顶尖模型封闭管理，并开始减弱美国模型在国内的可用性。然而全面实施双向禁令将产生高昂经济成本，大量美国企业高度依赖中国开源模型。数据显示，中国开源模型占美

国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模型的三分之一以上，禁用中国模型将严重影响美国公司的工作流程、成本与供应商架构。为此，文章提出合作方案：建立针对网络安全、生物武器和失控风险的部署前审查制度，由中立机构制定标准并进行安全认证。该制度统一适用于所有模型，美国可借此通过要求认证来管理外国开源模型，并鼓励中国采纳类似机制。即将举行的中美人工智能治理对话被视为关键的转向契机，双方可从建立信任的措施开始，如分享风险评估方法。两国应选择以技术安全（Safety）为核心的合作路线，而非地缘安全（Security）导向的对抗路线，从全面争夺人工智能霸权的边缘后退一步。

<https://www.techpolicy.press/how-the-us-and-china-can-step-back-from-the-battle-for-ai-model-supremacy/>

编译：张佳延

7、美国《外交政策》：北约正在分裂成两个阵营

7月15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发表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高级研究员艾玛·阿什福德（Emma Ashford）的文章《北约正在分裂成两个阵营》。文章认为，北约成员国虽就增加军费达成共识，但围绕跨大西洋联盟未来发展方向仍存在根本分歧。安卡拉北约峰会在军费承诺、联合公报等方面取得成功，但新增军费究竟是为了维系美国安全承诺，还是推动欧洲防务自主，北约成员国存在不同主张。文章认为，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对此提

出两条对立的路径。吕特主张推动欧洲扩大军事能力建设，争取特朗普继续履行对欧洲安全承诺，同时强调增加欧洲军费开支的目的不在于取代美国能力，主张欧洲继续采购美国装备。卡尼则主张欧洲和加拿大加快发展独立防务能力，以降低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他认为，面对不断调整战略重点且愈发难以预测的美国，中等国家应加强自主能力建设，提高战略自主性。欧洲国家目前仍未在上述两种路径之间形成共识。法国等国长期支持战略自主，而英国等国更倾向维持美国主导的联盟框架，这一分歧将影响北约未来军事能力建设和资源投入方向。文章认为，尽管本届峰会避免了公开冲突，但北约未来战略选择仍未明确。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6/07/15/nato-future-ankara-summit/>

编译：贺宇希

8、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迎合”特朗普策略取得一定成效但难掩战略困境

7月14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研究员里姆·莫姆塔兹（Rym Momtaz）发表题为《欧洲“迎合”特朗普策略取得一定成效但难掩战略困境》的文章。文章认为，面对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及欧洲盟友态度趋冷，欧洲过去一年多采取避免正面冲突、维持沟通的对美策略，在保持美国

对乌克兰有限支持、维持跨大西洋联盟基本运转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反映出欧洲战略自主能力不足。特朗普第二任期初，美国对乌克兰和欧洲盟友信任下降。在此背景下，欧洲将目标调整为维持美国最低限度参与，而非推动其扩大支持，并持续扩大对乌援助，运用“欧洲和平基金”、设立 900 亿欧元乌克兰支持贷款以及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PURL）等机制加强支持。2025 年，欧洲军事援助同比增长 67%，财政和人道援助增长 59%，并通过 PURL 向美国军工产业投入 48 亿欧元，以维持乌克兰获取美制武器。文章认为，这一策略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也加重了欧洲财政负担，挤压了自身国防工业建设及对其他战略方向的投入。欧洲虽展现出较强团结，并开始探索降低对美国部分领域依赖，但要真正实现战略自主，仍需形成统一战略认知、持续增加投入并推进国防工业改革，而欧洲内部政治变化及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都将增加实现上述目标的难度。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europe/strategic-europe/2026/07/european-sycophancy-worked-on-trump>

编译：罗方婕

9、美国 CFR：美伊协议破裂后美国筹码越来越少

7 月 13 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表外交政策学者马克斯·布特（Max Boot）的文章《特朗普的伊朗协议已崩溃，美国几乎没有好的选择》。文章认为，特朗普此前宣

称对伊战争仅需“四到五周”的预判已彻底落空，历经短暂平息后美伊冲突再度燃起。美伊于6月18日签署的凡尔赛谅解备忘录目前已宣告破裂。然而，伊朗强硬派并未满足，通过袭击奥曼海岸附近的商船并宣布关闭海峡，以此索要船舶通行费并迫使商船进入其领海。作为报复，特朗普重申对伊石油封锁，轰炸其军事基地，甚至宣称美国将作为“海峡守护者”加征20%的通道税。文章认为，在美民众对战争厌恶情绪高涨的背景下，全面入侵等军事手段并不现实。面对贬损的军事效能与依然高企的导弹威胁，特朗普正陷入在默许伊朗收税与冒着战争升级风险之间进行抉择的被动处境，再次印证了在缺乏清晰退出战略下开启“选择性战争”的盲目与危险。

<https://www.cfr.org/articles/trumps-iran-deal-has-collapsed-leaving-the-u-s-with-few-good-options>

编译：陈奕好

10、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美如何合作降低人工智能的紧迫风险

7月14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发表其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马克·麦卡锡（Mark MacCarthy）和科技政策顾问卡尔·肖南德（Carl Schonander）的文章《中美如何合作降低人工智能的紧迫风险》。文章认为，今年5月中美元首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但在对话机制的推进上存在挑

战。文章提出如下建议：其一，对话应重点围绕评估和减少人工智能风险，搭建信息、观念、计划、研究成果传递持续过程，而非一种谈判。其二，中方应将具备专业能力的技术专家纳入对话。若中方有政治人物参与，美方也应派出具有相应授权的高级官员，以匹配中方的政治层级。其三，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几乎全部采取开源模式。美方不应利用开源模型的安全性风险对中方施压，要求中方放弃或限制其开源模型的发展。其四，出口管制应与人工智能对话相分离。例如，让中方获取美国 Anthropic 发布的最新模型 Fable 5（或更强大的 Mythos 5）的做法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的“禁区”，不应成为技术讨论的议题。其五，中美政府间人工智能对话可以逐渐发展为全球性机制，但必须是非监管性的。中国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或七国集团会议上的人工智能联盟构想，可以独立发展，但不应和中美合作降低人工智能风险的对话相混合。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how-the-us-and-china-can-cooperate-to-reduce-urgent-ai-risks/>

编译：高靓瑜

11、美国兰德公司：美国推进“北约 3.0”面临战略掣肘

7 月 15 日，美国兰德公司（RAND）发表其高级政治学家兼美国大战略分析中心主任米兰达·普里伯（Miranda Priebe）的文章《如何实现北约 3.0》。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

所提的“北约 3.0”构想虽有合理性，但美国当前多项政策正阻碍其落地。文章认为，“北约 3.0”主张欧洲盟国承担自身常规防御的主要责任，美国则将资源转向其他优先领域并与俄罗斯开展外交合作。这一构想既能平衡美国资源分配、维系其在欧次要利益，整体风险又处于可控范围。然而，特朗普政府从多方面削弱“北约 3.0”战略：利用盟国的依赖性、动摇跨大西洋合作的根基、阻碍欧洲防务自主进程、拖延美国军事部署调整、发动伊朗战争。文章认为，为推动北约 3.0 愿景的实现，美国应从欧洲撤军并重新调整美军部署结构，同时将领土扩张、贸易提升、改变欧洲国内政治格局以及重塑中东局势等相互冲突的目标置于次要地位，最终以最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方式重新构建北约联盟。

https://www.rand.org/pubs/external_publications/EP71421.html

编译：李泓静

12、美国《国家利益》：关税拖累海军造船与维修

7 月 14 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表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麦肯齐·伊格伦（Mackenzie Eaglen）的文章《关税如何拖累美国海军的造船扩张》。文章认为，美国自 1908 年以来未新建大型公共船厂，现有四家政府船厂设施陈旧。虽已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现代化改造，包括珍珠港在建的海军史上最高价值项目“5 号干船坞”，但关税正在成为新的掣肘。以东海岸某修船厂为例，一台轨道式码头起重机因升级需要

从加拿大采购零部件，关税争议导致交付延迟 44 天，船厂在零件费 26.9 万美元之外额外支付了 6 万美元关税，占总合同调整价的 18% 以上。文章强调，尽管现行法规和国防合同中有国防豁免条款，但豁免执行存在不确定性且流程繁琐，船厂工人无暇应对。海军自身评估显示，设施与设备不足已导致航母损失超过 1300 个作战日、潜艇损失超过 12500 个作战日，而海军正同时应对伊朗作战与反封锁任务，时间极为紧迫。文章呼吁国会与行政部门协同，为维持兵力生成的国防采购设立全面、明确的关税豁免，结束这种“左手交右手”的财政空转。关税促进本土产业的目标虽重要，但不能以损害美军战力为代价，公共船厂亟需切实帮助以维持维修进度。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tariffs-are-slowing-the-us-navys-shipbuilding-surge>

编译：白一冰

13、美国《外交事务》：特朗普政府正使美受全球更深层次的不信任

7 月 15 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研究主任理查德·怀克（Richard Wike）的文章《世界正在放弃美国：这一次，反美情绪有所不同》。文章认为，过去即便美国国际形象因伊拉克战争或特朗普第一任期而明显下滑，其长期积累的软实力和国际声誉仍能支撑其最终回升；但自特朗普 2025 年重返白宫以来，这一基础正现裂痕，

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在性质和深度上都与以往不同。文章认为，当前全球对美国的不信任，已不再只是针对具体政策，而是进一步延伸到对美国民主和价值观本身的怀疑。调查显示，在受访多数国家中，认为美国政府尊重本国人民个人自由的人已成为少数，这一评价较拜登任期初明显恶化，欧洲尤为突出。同时，国际社会不仅反对特朗普的移民、关税和气候政策，也更担忧美国在第二任期内更频繁、更不受约束地动用硬实力，认为其正在威胁全球稳定。文章进一步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前几届政府中最受外界反感的两种特征结合起来：一方面延续美国单边使用武力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放弃美国以往自诩的国际领导角色。在许多国家看来，美国如今既不愿受规范、承诺和盟友关系约束，也不再可靠地提供和平、稳定与合作。文章认为，世界对美国作为自由国际秩序领导者的信心正在流失，若美国不能重新证明其仍然重视自由与国际责任，其长期积累的国际善意终将被耗尽。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world-giving-america>

编译：刘晓

编译：贺宇希、罗方婕、陈奕好、高靓瑜、李泓静、白一冰、
刘晓、程果、孙韵雯、钟珺雯、高美琳、张佳延

审核：刘源、郑乐锋、申青青、周武华